

李庄故事

——访“四大抗战文化中心”之李庄古镇

本报记者 韩冬



国立同济大学三十五周年校庆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随着日军铁蹄踏入南亚，日寇的飞机在昆明天空更加肆虐。为躲避战乱，于1938年就搬迁至此的国立同济大学等部分高等学府、学术机构急需寻找一处更加安全的地方。

获闻同济大学正迁川觅址，四川南溪县李庄镇（1983年划归宜宾市翠屏区）开明士绅罗伯希、王云伯向同济大学发去了“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16字电报，力邀其迁往李庄。

1940年秋，同济大学应邀迁往李庄。随后，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等10余所文化科研机构也内迁至此。

“四大抗战文化中心”之一

李庄古镇位于四川省宜宾市东郊19公里处长江南岸李庄坝，距今已有1470年建庄史，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古镇”之称。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3000位李庄人请神像、迁牌位、腾民房、匀口粮，以饱含民族情怀的大义之举，保障了12000余位大师、学子在这里继续科学和文化的研究。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如李济、傅斯年、陶孟和、吴定良、梁思成、林徽因、童第周、梁思永、劳干等在李庄完成了《中国建筑史》《殷虚甲骨文字典》《殷历谱》《六同别录》等众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专著；新中国的科学院院士中，有11人曾在李庄就读。李庄也因此与重庆、成都、昆明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之一，铸就了李庄古镇“万里长江第一古镇、大师学子第二故乡”之美称。

梁思成年轻时曾遭遇车祸脊椎受伤，到李庄后，车祸受伤的后遗症不时发作，经常疼得不能坐立。即便如此，他也被李庄规模宏大、具有明清时期建筑特色的庙宇、殿堂、古戏楼所吸引。在考察了建于李庄镇镇北2.5公里外的石牛山上的明代建筑——旋螺殿后，梁思成赞誉道：“其梁柱结构之优，颇足傲于当世之作”。他把这民间工匠创造的力学原理，借鉴、

传承和创造性地运用到1945年参加联合国会议大厦顶部的设计中，并将它与李庄栗峰山庄等收入自己的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中。梁思成还对位于长江路的奎星阁作出了极高评价——“是从上海到宜宾沿长江二千多公里中建造得最好的亭阁”。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故宫博物院将近17000箱、数十万件国宝文物，分三路迁至抗战后方，其中3000箱国宝文物就随筹备处迁至李庄，放置在张家祠内，得到了完好妥善地保存。在李庄的近6年时间中，中央博物院连续举办了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内的史前石器、青铜器、贵州苗族服饰、云南丽江纳西族文化、十三种汉代车制、古代铜镜等等展览，轰动四方。

李庄的盛事

慧光寺（禹王宫）内的戏台，是四川保存最完整的古戏台之一。1942年5月国立同济大学35周年校庆就在这里召开。国民政府教育部、卫生部，四川省政府等派代表应邀出席。在东岳庙前的运动场上，师生们举行了纪念仪式及盛大的运动会开幕式，时任同济大学校长的丁文渊还请来了驻军的乐队奏军歌，请来空军教练飞机飞临李庄操场上空，为同济师生、应邀嘉宾、本地民众及外地观众等上万人表演了花式飞机；住在几十公里外的江安国立剧专也前来

和同济大学的同学们在这里联合上演了曹禺的名作《雷雨》和《日出》。这是同济校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李庄的一件盛事。

在军民街的祖师殿还发生过一件趣事。当年，同济大学医学院曾于此，同济师生就在庭院中进行学习。曾经有位老同学爬上祖师殿屋顶，看到下面的尸体后吓得摔了下来，此后便有“下江人”（指同济师生）吃人的谣言。为了平息谣言，傅斯年等决定举办一次科普展览。这次科普展览不仅平息了谣言，在社会上还造成巨大影响，同时也让中



美国哈佛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夫妇来访李庄，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交流

郑振铎的藏书癖

韩守泉

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

郑振铎在《永在的温情》中回忆鲁迅送书给他的事。他说：“我很想看看《西湖二集》（那部书在上海是永远不会见到的）又写信问他有没有此书。不料随了回信同时递到的却是一包厚厚的包裹。打开了看时，却是半部明末版的《西湖二集》，附有全图。”“见了这《西湖二集》为之一狂喜！而他的信道，他现在不弄中国小说，这书留在手边无用，送了我吧。这贵重的礼物，从一个只见过一面的不深交的朋友那里来，这感动是至今跃跃在心头的。”“我生平从没有意外的获得。我的所藏的书籍，一部都是很辛苦的设法购得的；购书的钱，都是中夜灯下疾书的所得或节衣缩食的所余。一部部书都可看出我自己的夏日的汗，冬夜的凄裸，有红红的睡眼，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僵硬和酸痛的手臂。但只有这一集宝贵的书，乃是我书库里唯一的友情赠与。——只有这一部书！”

郑振铎在《售书记》中讲述了他在买书之喜悦和售书之痛苦的心情。他说：“说到售书，我的心境顿时要阴暗起来。谁想得到，从前高高高兴兴，一部部，一本本，收集起来，每一部书，每一本书，都有它的被得到的经过和历史；这一本书是从哪一家书店里得到的，那一本书是如何地见到了，一时踌躇未取，失去了，不料无意中又获得之；那一本书又是如何地先得到一两本，后来，好不容易才从某书店的残书堆里找到几本，恰好配全，配全的时候，心里是如何的喜悦。”“至于明刊精本，黑口古装者，万历纸竹，传世绝罕

者，与明清史料关系极重者，稿本手迹，从无印本者，等等，则更是见之心暖，读之色舞。”“我的书都是‘有所谓’而收集起来的，这样一大批地‘去’怎么能不痛心呢？售去的不仅是‘书’同时也是我的‘感情’，我的‘研究工作’，我的‘心的温暖’！当时所以硬了心肠要割舍它，实在是因为‘别无可长物’可去。不去它，便非饿死不可。”

郑振铎还在《回回头去“附录”》中谈到买到好书的心情。他说：“我买书不大讲价，有时买得很贵，然因此倒有些好书留给我。有时走遍了那几家而一无所得，便丧没趣而归；有时却于无意中得到那寻找已久的东西，那时便如拾到一件至宝，心中充满了喜悦。往往地，独自地到了一家菜馆，以杯酒自旁，一边吃着，一边翻翻看那得到的书籍。如果有什么忧愁，如果那一天是曾碰着了不如意的事，当在这时，却是忘得一干二净，心中有的只是‘满足’。呵，有书癖者，一切有某某癖者，是有福了！”

毛泽东当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见到郑振铎，听人介绍郑振铎收藏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和古籍，在祖国的文物工作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就对郑振铎说：“人民把文物工作委托给你了。”后来，毛泽东收到画家姚虞琴送的王夫之的稀世墨迹，便写了一封信给郑振铎，并把那幅墨宝交给他保存。

郑振铎的祖籍是福建省长乐县。1898年生于浙江省温州市（即永嘉）。他对福建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曾多次回到福建，写下了《移山填海话厦

门》等文章讴歌故乡的变化。他与许地山、冰心等同乡成了至交，他们之间因藏书而加深了友情。郑振铎在《悼许地山先生》中说：“他是我学生时代的好友之一，真挚的有益的友谊，继续了二十四五年，直到他死为止。”“许地山在香港教书，我个人也受过他不少帮助，我为国家买了很多的善本书，怕上海不安全，便寄到香港去；曾经和别人商量过，他们不肯负责这责任，不肯收受，但和地山一通信，他立刻答应了下来。”“3000多部的文明书，抄校本书，都是寄到港大图书馆、由他收下的，这些书是国家的无价之宝。”“这种勇敢负责的行为，保存民族文化的功绩，不仅我个人感激他而已！”

冰心在《怀念振铎》中说：“在五卅时代，‘福建省抗日学生联合会’里，”“我都从振铎的慷慨激昂的发言里，以及振铎给几个女师大同学写的长信里，看到他纵情地谈到国事，谈到哲学、文学、艺术等，都是大家纵横，热情洋溢。”当年在北京燕京大学，“振铎的藏书极多，那几年我身体不好，常常卧病，他就借书给我看，在病榻上我就看了他所收集的百十来部的章回小说。”

1936年秋，冰心将再度赴美；郑振铎在上海的家里为她饯行，在那次席上冰心初次尝郑太太亲手烹调的福建菜。1958年，冰心与郑振铎在国庆节观礼台上相见，郑振铎笑着对冰心说：“你不是喜欢我母亲做的福建菜吗？等我们都从外国回来时，我一定约你们到我家去饱餐一顿。”没想到这成了他们两人最后的一次谈话。10月18日郑振铎坐的飞机在喀山出事。

郑振铎遇难的消息是巴金告诉冰心的。冰心说：“巴金劝我不要难过（其实我知道他心里也是难过的），我难过不难过吗？我难过的不只是因为失去了一个良师益友，我难过的是我们中国文艺界少了一个勇敢直前的战士！”

今日李庄

1946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驻在李庄的各个学校、学术机构陆续返回，李庄再一次恢复了往日的清幽。

2012年，宜宾市翠屏区成立了李庄产业园区管委会，对李庄古镇的“保护、利用、开发”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机遇。8年来，李庄完成了绿化、亮化、管网、道路、民生、景观、展览展示、配套等工程项目近40个，先后荣获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小城镇建设试点镇、全国首批特色小镇、“全国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民盟中央传统教育基地”“中国民族优秀建筑之乡”“四川十大旅游目的地”“全省最美旅游乡镇”等30多个中、省、市荣誉称号。

如今，李庄浓厚的教国、治学气息依然荡漾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当年大师学者们留下的足迹，已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李庄悠久文化、品鉴中国文化脉搏、中国建筑艺术和游览观光的好去处。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鲁迅一生都钟爱报纸副刊，很多脍炙人口的不朽杰作都是在当时的报纸副刊上最先发表出来的，后来收入到各种选集中，更广泛地流传于世。

鲁迅代表作之一《阿Q正传》最初分章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自1921年12月4日起至1922年2月12日止，每周或隔周刊登一次。也是中国报纸副刊早期白话文连载小说代表作之一。

鲁迅的大多数杂文都是先用笔名发表于当时的全国各地的报纸副刊上的。有的报纸副刊是常年刊登鲁迅的杂文，使鲁迅不经意间成了报纸副刊的“专栏作家”。如上海的《申报·自由谈》，有段时间几乎成了鲁迅先生的“每日家庭作业”，一天一篇或隔天一篇，吸引了当时不少的读者。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20世纪初，保险在中国还是新生事物，保险业主体基本为外资、合资公司所垄断，其中人寿保险刚进入中国市场，国人对它的认识尚处于较为陌生的阶段。

1933年，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的胡适，应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之请，欣然撰写了一则言简意赅的公益广告，发表在4月9日上海《申报》的“人寿保险专刊”第4期。其内容为：“人寿保险含有两种人生常识：第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壮年要作老年的准备，强时时要作疾弱时的计划。第二，‘日计不足，岁计有余’，所以微细的金钱，只需有长久的积聚，可以供重大的用度。”

胡适笔下的这则广告篇幅短小，语言平实，含蓄深邃，以人们通俗易懂的文句，阐述了人寿保险兼具养老、医疗、储蓄、投资的功效，对宣传和普及保险知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唐驼(1871~1938)，原名唐成烈，字攸权，号曲人。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抗倭英雄唐荆川之后。他是我近代印刷业的开拓者。

唐驼小时家境贫寒，营养不良，29岁时曲瘦病发，右背隆起，形成驼背。别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唐驼子”，他不但不恼怒记忆，反倒欣然接受。1905年，他在为曹朴的《孽海花》题写书名时，索性落款“唐驼”。从此，唐字衡以“唐驼”行世，“字衡”原名反而渐渐被遗忘了。

唐驼的字写得很好，为了广揽生意，打开销路，他想了一个好办法来做广告。20世纪20年代末的一天，一只小型飞机在上海低空盘旋，突然撒出了许许多多色彩斑斓地写着卖字润格的小型降落伞，引得万人伫立街头仰望，产生了出奇制胜的轰动效应——原来这是唐驼在为自己的字作广告。

唐驼的名声越来越大，到他家买字的人络绎不绝。中华书局、世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开国元勋陈毅年轻时爱好文学，写过小说、诗歌和散文，也翻译过法国文学作品，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在战争年代，他笔耕不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坚持诗歌创作。

1959年12月9日，他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入会申请表“现在工作单位及职业”栏内，他填写的是“国务院工作人员”，体现了他是自觉把自己作为“普通一兵”而置身于革命队伍之中。在“从事文学工作的简历”一栏中，他这样写道：“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并研究法国文学。1922年回国搞政治活动并做新闻记者，开始写诗及小说。1924年以后做革命职业家直至现在，文艺活动作为业余工作断断续续，但未曾完全放弃，写诗的时候多些。”对其他栏目，他也是有问必答，一丝不苟。

鲁迅的副刊情结

黄山

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脑和互联网，作者通常都是把手写稿邮寄或送到报社编辑手里的，鲁迅的手稿基本上是采取三种途径送到报纸副刊编辑的手里的：第一种是邮寄到报社，第二种是编辑来家取，第三种就是鲁迅亲自或托人把手稿送到报纸副刊编辑的手里。有的报纸副刊编辑在稿件和样报的一来二往的传递、接收中还和鲁迅先生成了生活中的朋友。

鲁迅与副刊编辑的手稿往来，从1918年开始到1936年他去世前一个月，一生的文学创作都与报纸副刊紧密相连。通常，鲁迅白天要忙于他事，夜晚不惜熬夜为报纸副刊写稿，甚至一夜连写两篇稿，通宵达旦，可见鲁迅对报纸副刊的青睐和重视了。

胡适代言保险

周惠斌

胡适不仅乐于向国人宣传和推荐保险，他在生活中更是身体力行，率先购买人寿保险、财产保险，走在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参与保险理财的前列。1935年12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到浙江兴业银行，到中孚银行，把寿险费及书籍保险费还了。”文字虽短，却印证了胡适拥有居安思危的保险意识，并且积极付诸行动，把自己的健康和私人藏书纳入年度保险计划之中。

1949年，胡适离开大陆定居美国纽约后，一度考虑参保医保，却因年老多病，被保险公司无情地拒之门外。他因此不无感慨地说：“美国资本主义很坏，我这个年纪大了后，我想保险，他们嫌我年纪大，嫌我心脏病……”以致他心脏病复发入院治疗时，一度连医疗费都难以筹措。

唐驼妙做广告

周二中

唐驼还是那个较真的人，一次，他到常熟拜访大书法家萧退庵，自称是“写字匠”，称萧为大书家。他请萧退庵刻印，恭恭敬敬奉上礼金。萧退庵给唐驼刻姓名字章，因《说文》里没有“驼”字，萧退庵按常规用“佗”字代替，印章刻成，送去。唐驼一看不对，退了回来，理由是我要刻的是“唐驼”，不是“唐佗”。“唐驼”是注册商标，唐驼很看重商标的价值，他要维护自己的姓名权。萧退庵也是有个性的人，见印章被退回，火了，说：“唐某人不想做人，执意要做畜生，我不跟这样的人打交道。”

一位为名而争，一位为字而言，两位都很有性格。

陈毅申请加入作协

夏明亮

陈毅在与中国作协所属刊物的接触和交往中，也时时处处体现着他的谦虚态度。有一次，他寄给《诗刊》杂志三首诗，在附信中写道：“把近未写的三首诗仓促稿送《诗刊》凑趣；如蒙登载，要求登在中间。”他风趣地自嘲：“我愿作‘中间派’。如名列前茅，十分难受；因本诗能名列丙等，余愿足矣。”后来在送《冬夜杂咏》一组诗时，他又在附信中写道：“为《诗刊》凑趣，便旧作《冬夜杂咏》抄来塞妥，仍请按旧例放在中间或未尾为要。”

陈毅如此严于律己，并非偶然。他在给中国作协书记处的一封信中说：“至于文艺写作，便得即大胆尝试，工拙不计。想做革命又写革命，此宏愿也，何日能达到几分，不敢预言，愿努力为之。”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